

推动科技考古融合发展

袁靖

■精彩阅读：

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确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近年来，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和丰硕成果。其中，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的大幅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推动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当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逐步推广，正在给中国考古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加强科技考古研究，推动其融合发展，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把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称之为科技考古，其内涵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对考古遗址进行勘探，对遗址所在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出土的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鉴定和测试，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以获取更加丰富、更加全面的古代人类活动的信息，在考古学研究思路的指导下，经过归纳、分析和探讨，从整体上拓展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提高考古学研究的科学性，体现考古学研究的价值。

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数字考古、年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器科技考古、玉石器科技考古等12个领域。这些领域的众多科研成果，为考古遗址测定了绝对年代，为古代历史提供了科学证据，涉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中的诸多细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要进一步做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强化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不断融合，进一步推动科技考古的发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 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之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结合不同的考古实际状况，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计划和考古人员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设置探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和整理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年代测定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制约或影响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骸，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形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及演变，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及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只有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2. 加强学科之间的相互沟通。现在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分别来自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有各自的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进，原来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员和原来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互相都有一个学习对方的过程。前者要认真了解自然科学家探讨物质世界的各种方法和原理，开拓研究思路，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而后者则要注重认识考古学家是如何去解释古代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充分利用多种仪器设备的性能，开发各种考古资料的价值。全部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才能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运用在勘探、考察、鉴定、测试、分析各种与考古相关的资料中，

而这样的研究结果才能与考古学的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现出多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

3. 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看法，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

4. 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总结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人骨研究、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有机残留物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增强了考古学的科技含量，显示了考古学能够全方位地对古代社会开展研究。我们要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科技考古正在助力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学科发展进程，放眼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没有一个学科如考古学那样，呈现出如此快速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如此众多的学术生长点。当年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的建立，为确立中国考古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科技考古各个研究领域的确立和完善，正在全面丰富、充实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科技考古，进一步加强科技考古与田野考古的密切融合，推动中国考古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福柯对于知识与空间的具体互动过程以及“空间时代”的强调，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呈现了空间转向。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化这一时空局面，文学与文化研究要面对的知识生产的空间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知识在跨文化空间中的改变、创新、生成。那么，就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而言：学界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就包括：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在不同的时空中经历了何种历程？在此历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如何协调差异问题？以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为载体的中华文化跨文化旅行，有着何种相同的、或不同的经历？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思考、面对的。李庆本教授等人在其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中，就从不同层面面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

该著作是李庆本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回答了“何为跨文化阐释”这一问题。李庆本教授写道：“跨文化阐释学就是以跨文化阐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所谓跨文化阐释，是用一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来解说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它要求阐释者能够暂时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用对方的语言或自己的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理论与文化，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的目的。因此，它更加注重和强调阐释的空间性。”

第二部分则以历史经典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旅程为研究中心，重点考察了《周易》《诗经》《四书》《楚辞》《木兰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文本在跨文化空间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接受、改造、变化过程。该部分不仅在文化层面，也在语言层面、媒介层面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从而使研究获得了物质与思想两个维度的基础。

第三部分则将研究视点转向接受者，即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接受和认知。该部分通过多个层面进行：一是通过实证考察，分析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考察将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华留学生及海外孔子学院学员）以及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报道；二是以21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及东亚汉学家的中国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解析、归纳和总结；三是中华文化国际接受的实证研究，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探讨来华留学生与孔子学院学员对中华文化认知与接受的内容、过程、方式、途径；四是总结富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推广手段和传播机制，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四部分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层思考与政策建议。该部分从实践层面重点探讨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理由，并结合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在笔者看来，这部凝结了李庆本教授研究团队10年心血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是“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提出以及论

跨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

——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

李学萍

述，具有跨越二元对立思维藩篱的意义。在世界比较文学内，无论是“影响研究”，抑或是“平行研究”，都建立在二元等级对立思想基础上。对于跨文化沟通实践而言，“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文化实践及其形成的文化高低等级价值链，为跨文化沟通修建的不是桥梁，而是藩篱。而基于翔实、细致地对王国维、叔本华、康德、胡适等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相遇、互动、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具体过程之绘图，李庆本教授揭示了文学和文化相遇的文化“自然”——相遇伴随着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去掉二元等级对立思维来看待这样的相遇和相互改变，影响与接受、源头与变异之间的二元对立就自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源头之变异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变异生成的新质带给世界文化的多样与丰富。

“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于中西理论沟通重建了希望。李庆本教授指出：“‘理论旅行’的过程不可能是绝对不变的，中西理论之间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可跨越的鸿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在“知”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进而指出：理解，或“知”，是个包含多重维度的问题——“知”有认识论的“知”，也有本体论的“知”。对于跨文化阐释而言，挣脱封闭的认识论单一思维，走向本体论思维看待“知”与“理解”问题，就能看到理解的可能性。

不过，李庆本教授并未否定跨文化阐释在异质性空间中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差异带来的挑战。在他看来，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用一种整体的视野看待世界各国、各种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就跨文化研究而言，他强调用一种“既……也……”的包容性思维来看待不同地理、国别、语言、文化中的人类同一性与差异性，即人类的“同素异构”结构。

三是该著作的学术探究与追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李庆本教授通过强调“同素异构”结构，为我们理解“共同体”的“共同”与“差异”提供了整体视角。“共同体”既包含同一性，也包含差异性，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共同体”这一整体之中的。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包含差异的共同体。这也意味着，“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所要服务的共同体概念是要着力解决包含差异的沟通问题的，通过强调“在”之间的关联，进而说明理解与沟通的本体论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沟通与理解才变得可能，而也恰恰是这一可能性，共同体才具备了存在、生长、繁荣的根基。

统观《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它包含了理论支点建构、中华文化经典文本在不同时空中的旅行历程图绘、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及在定性、定量层面展开的中国文化认知调查，呈现了研究方法、文本、材料上的复调结构，为学界提供了一幅中国文化跨文化研究的大型图绘。该图绘有助于破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二元等级思维、为跨文化沟通与理解建构希望，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深情的旋律，流淌在黄浦江畔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家共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顾意亮

10月20日下午，沐浴着暖暖的秋日阳光，满怀着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家，欢聚在黄浦江畔的浦东政协委员协商活动中心。

沿江眺望，委员们和艺术名家们饱览浦东开发建设高速度、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奇观，感受党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辉煌，无不感同身受，深切认同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回到活动中心，何占豪、梁波罗、童自荣、赵静、王苏、陈少泽、王景春、刘家祯、马晓辉等艺术家们畅谈自己的艺术实践，赞颂、感谢党组织坚持科学领导与对艺术家成长的关怀、帮助。

九十高龄的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回忆自

己年轻时时代在上音求学期间，在党组织引导、帮助下，与陈刚成功创作《梁祝》的过程，激动地说，“没有党组织的关心扶持，就没有新中国的新一代音乐工作者；没有党组织坚持科学的领导，就没有《梁祝》。”

电影艺术家梁波罗回顾自己主演的《51号兵站》拍摄过程，难忘厂领导热情培育新人的决策与前辈电影大家“众星捧月”的胸怀，感叹党组织的温暖与前辈的崇高始终在怀。

电影配音艺术家“佐罗”童自荣，感佩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把大量海外的经典艺术作品，通过译制介绍给中国观众，终身勤勤恳恳，倾其全力架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胡演奏家马晓辉表示，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中国民族音乐通向世界的大门。近几

年来，她带着一把二胡走进“一带一路”，走进欧美许多国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绽放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自信、自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位演奏家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愿虔诚地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而努力奋斗。”

浦东新区政协委员和机关青年干部代表结合艺术党课和自己的本职工作，交流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决心与创新创业的宏伟愿景。

交流活动中，艺术家还用诗与歌深情表达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对党的无比热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苏朗诵《放声唱》，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上海轻音乐团青年演员丁一凡独唱《金梭与银梭》，语言艺术家方舟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歌唱美好生活，歌颂可爱的祖国。戏剧家陈少泽朗诵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抒发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志豪情。

第六代“江姐”、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何晓楠演唱了江姐牺牲前献给战友的赠言，则展现了共产党人“我为祖国生，我为革命长”“我为共产党把青春贡献”的壮美精神世界。动人的歌声，生动表达了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与上海艺术名家永远跟党走和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新征程的共同心声。

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姬兆亮和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王小平出席席席席。区政协领导们对艺术家们的生动党课与精彩演出表示由衷感谢，要求浦东新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们学习艺术家们坚定的政治信仰，坚持创新、追求卓越的艺术品质，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更好地立足浦东引领区建设目标，履职尽责，作出更大贡献。

画眉山龙王庙随感

李朝俊

琉璃瓦的山门巍峨在上，石阶红墙依山绵延。山上产黑质黛石，金代曾采石为宫女画眉，因而得名“画眉山”。画眉山在北京香山后山，山前是奔腾的京密引水渠。

走进画眉山，必进龙王庙。山门一面向阔4.6米，进深有2.18米，单檐歇山顶，覆黄色琉璃瓦，脊兽为仙人骑凤，龙、凤、狮伴行。

从甬道登上14级石阶，蓝天中山门上，高悬着“敕建黑龙潭”匾。黄瓦红墙绿瓦间，北京市文物局铜制说明牌，在我眼前一亮：“黑龙潭及龙王庙，明清两朝皇帝祈雨的地方。清乾隆三年（1738年）封龙王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由黑龙潭及潭外回廊和潭西龙王庙等多种建筑与石碑组成。龙王庙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庙内现存明、清及民国重修碑、御制碑等多块。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黑龙潭及龙王庙，作为大运河北京段的一部分，归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名录中。

一进龙王庙门，右侧为黑龙潭，左侧为眉园。据说原有台阶108级，现有据可查是97级岩石之梯。方志言“龙潭围广十亩，水从石罅中去，终年不干，下溢回间，潺潺有声”。

黑龙潭龙王庙神奇处，在于打破北京寺院坐北朝南格局，与名扬天下的大觉寺如出一辙：坐西朝东。庙面东依山而筑，分为三阶，层层上升。三组高高低低，各组依次为12级阶、17级阶、33级阶。三组石阶间，有四座碑亭，两两一组，东西对称，静立过渡平地之上。人登石梯喘息急促，正好遇见碑亭碑文，近前辨别去读，不知不觉气息复常，汗除心静腿脚轻松，有文在心，有情在心，有力在心，出脚迈步再上高石阶再探新风景。

我见12级阶梯右侧，有株一级古树，“紫薇科楸树，年代明朝，距今约531年”，有环抱之粗，教丈之高，高通二级台阶之巅牌楼之上。左侧两株

树，一株靠前庙墙3米距离，小径桶粗细，黑皮绿叶枝头，结满青色黄色的柿子，18块黄、灰、黑、青石围在根部，筑成一尺来高的台地，若蒲团围在这棵树四周。一株紧贴石阶上护梯墙，叶如常见的刺槐。开裂的黑皮树干长出刺猬之尖，只是刺尖色彩泛黑泛灰，尖上生尖刺上长刺。若不是树干一杈绿果，我真一时认不出此树来。尖尖刺和青果，黑黑干刺配绿果，这不就是老家后山上的皂角树吗？！想起了老，童年我在树下捡到绿紫色的皂角荚。啊，这棵龙王庙前大树，是珍稀的皂角树！

登上17级阶往下看，皂角树黑粗干两丈之上，三只粗枝变六枝，六枝树枝变无数枝，像极了龙王的无数龙爪，腾云驾雾在画眉山山。

人登三组阶梯最后一段，此处有座高耸入云的牌楼，另各一株柿子树，在石阶梯两侧，如站在牌楼后的绿袍大将军，威武地护卫着。这是进龙王庙的必由之路，这是大自然的巧夺天工。人行其上，小桥湖畔，花丛林间，观赏万物，或春来鸟语花香，或夏至蝉鸣悦耳，或秋临萤火火织，或冬到雪夜月光。海淀的淀水田园，青山中寺庙深宅，无垠的稻香湖景……

穿过一左一右两通御碑亭楼，再登上7级青石台阶，跨过高高的红漆门槛，“黑龙潭”香炉生紫烟，将15级之上的龙王殿，升腾在山之上云之中。我心在龙王庙徜徉，我情在古树、水岸、深潭流连。

龙王庙，黄瓦之上，草长花开，小树闹叶，得风得雨，茂盛生长。树上蝉鸣，路上车鸣，山上鸟鸣，我心则鸣，坐青石上，挥笔记之：青瓦黑瓦，四角黑龙，庙宇龙宫，淀潭之地，浮水之滨。这皇家龙王庙殿，历史悠久，布局考究，庙宇行宫，彼此统一，单独成景，建筑艺术，民族瑰宝……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